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¹

罗艳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近朱者赤”似乎也适用于历史学者。但凡对所研究的对象浸淫有日，在研究者自己的行文中往往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气息浓厚的朝代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美国中国史学界相继出版了几部明朝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著作，其字里行间就多少透着一股“明人”风范。在《明代社会：14—17 世纪的江西泰和》（*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xi,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的开篇，达第斯（John W. Dardess）沿着文人笔下的乡间小路，引领读者徜徉在明代泰和连绵的山丘、起伏的稻田之间，穿过小河、园林、院落，一直到达时人的居所。一趟明代泰和的乡间之旅，俨然就是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而与类似区域研究中模式化的背景介绍相比，这种行文与编排更有助于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两年后，卜正民（Timothy Brook）将这种匠心独运的编排与写作，运用于讲述明代商业与文化的整本书中。2004 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由方骏、王秀丽、罗天佑翻译的简体中译本，中文书名为《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匠心独运的安排，首先表现在全文的结构上。也许是秉承了他早年对明清时代地方志研究的旨趣，卜正民挑选了一位晚明的地方志作者——歙县知县张涛，来作为他展示明代商业与文化历史的“导游”。张涛的个人生命史，以及他对社会和明朝历史的季节隐喻，被卜正民巧妙地借用为全书各章的标题，即分别为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的四章。明初是安详静谧的冬季，明中期是喧闹的春季，张涛所处的时代则是纵乐与困惑交织、疯狂而燥热的夏季，最后一个季节是秋季，一个混乱的季节。其中前面三个季节，也是对应于作者对明朝所作出的前、中、后的时段划分，每一个时段都是从世纪中叶开始的大约一百年时间。

贯穿张涛的季节隐喻以及卜正民著作的两大主题，分别是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关于二者在明代将近三百年历史中的发展，卜正民已经对此进行了翔实的编年叙述，如果试着对其进行纪传体的转换，大致可以分别归纳如下：

对于明代以商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作者主要是对商业中的商品、市场、商人等问题进行叙述。粮食是商业贸易品中明朝政府最关心的，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虽然按照明朝的开国设计，在代表着“自给自足、勤劳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精神的冬季，政府倡导的粮食储备制度是主要的备荒手段，但商人及其支撑着的商品粮市场的存在，仍不失为缓解因粮食供应不足造成混乱威胁的补充方式之一。不过到了明中叶，明政府逐渐放弃了利用粮仓去影响食物供应的努力，粮食开始商品化。最终，粮食成为了明后期最广泛的贸易性消费品，而日渐发达的粮食市场也促成了其他物品的商品生产，例如纺织品。在市场贸易方面，则经

¹ 1998 年之后，关于此书已经有多篇英文书评，其中包括美国明清史学界的专家作出的专业性评价，可资对照参考。具体参见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May, 1999), pp. 479-481, by John W. Dardess (达第斯).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3 (Jun., 1999), pp. 876-877, by Lynn Struve (司徒琳).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May, 1999), pp. 479-481, by William T. Rowe (罗威廉). 以及散见于 *China Quarterly*,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Pacific Affairs*, *Review of Politics* 等期刊的书评。

历了从明初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到明中叶开始了融入世界市场的海上贸易，以及明后期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日渐繁荣的对外贸易的过程。作为商业贸易的主体，商人的活动保证了明朝经济的顺利进行，但在谨守严格“四民之分”的明代初期，商人的地位是倍受压制的，其数量也并不是很多。随着明代中期交易网络规模的扩大，参与商业活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后期，商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提高。在拥有了成功与财富之后，这一时期，大量商人也热衷于谋求获得士绅的身份。要之，作者大抵上完成了这样一项工作，即勾勒出“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看起来向前发展和不间断的商业扩张的轨迹”。

至于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明代的文化，相对商业而言，归纳起来似乎要复杂一些，这部分是因为“文化”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尽管作者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通观全书，还是可以总结出其文化概念的两个特征。首先是文化所具有的知识特性。在论述文化的篇章中，书籍的出版印刷以及士绅的言论行为贯穿始终，前者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而拥有知识则是进入士绅阶层的要件之一。在经历了明前期缓慢的发展之后，明中叶起，由于商业的介入，印刷业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得知识的获取与传播更加容易。到明后期，书籍印刷更具商业的目的和本质，带动了如刻书的地区化、藏书家的出现、丛书的刊行以及国家禁书政策的失败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得益于知识的日益普及，以及日益繁荣的商业经济，越来越多的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的士绅阶层。随着国家力量在明中叶开始衰落，他们成为维持地方社会儒学化的主导，而面对日益崛起的商业和商人集团，一方面士绅们在享受着商业发达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文化上的型塑，保持其在社会文化上而非经济上的地位，例如从明代中期开始，日益知识化了的士绅文化消费和鉴赏行为、象征资本化的服装和性的时尚等等。面对日益远离儒家标准的社会秩序，士绅的批评与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本身也成为了明代文化的表征之一。本书文化概念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行为性，即不拘泥于知识性的形而上，也关注生活本身，哪怕是连姓名都无从考证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在讨论明中期，政府对海上贸易的禁止政策与漳州人的海外贸易热忱时，针对所谓文化上的大陆本位主义观点，有过这样的论断——“文化是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的所思所想”。（中译本的第134页。英文原文为“*But culture is what people do, not what they think they should do.*” 英文本第124页。）如果我们姑且对其断章取义的话，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对明代文化的态度与视角。因此，通过作者对南京城墙墙砖上窑匠的考证、对波斯使团和遭遇海难的朝鲜人穿行中国经历的描述、关于包括妇女和游民等繁荣社会边缘的平民的考查等等，我们了解到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之外丰富的明代社会图景，拓展了传统文化史的视野。即便是本书重点论述的士绅阶层的文化思想史，也是建立在士绅对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的改变而阐发的思想和采取的行动基础上的。一定意义上，我们应该有意强化这样一种潜意识，“没有生活的文化史，不是真正的文化史”。

尽管出于叙述的需要，以上对贯穿全书的两大主题分别进行了归纳，但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始终是交融在一起的，就如同批评商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那些士绅们，他们同时也是商业繁荣主要的受益者一样。不过在本书的英文版与简体中文版分别出版后，两个版本中各异的封面装帧，及其所暗含的对不同主题的强调，饶是令人玩味不已。

1998年出版的英文版，封面的底色调是蓝色，主体是一副人物肖像。类似的肖像经常出现在一些规制齐整的宗族谱牒中，而这幅画像则是从正文中诸多精美的插图中挑选出来的。根据正文中的插图说明文字（中译本第286页，图37），我们得以知道肖像主人的大致情况：肖像的主人名叫杨茂林，是明朝的一位县级生员（庠生），身着县学生员服装的主人公看起来年纪不大，但已经是作为前清的先祖画像而被绘制下来，因此他极有可能丧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战火之中。而简体中文版的封面给人的第一印象则是金黄色，这一方面是因为选择的插图因年代久远而具有的金黄的本色，另一方面是因为插图内容所呈现出的热闹的情景。插图似乎是从一幅描绘明代江南市镇生活的画卷中截取下来的一段，画面正中，一座拱

桥横跨河上，桥面中央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两侧则聚集着贩夫走卒，商肆林立；桥梁连接的对岸，一处米店墙上“公平交易”的标语依稀可见，一些士绅模样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娱乐玩耍。河面上，运输粮食的船只正在码头卸货，它们和其它船只一起，在帝国的水道交通系统之中穿梭。

两种版本，两幅封面，其所折射的是不同的话语语境。就本书标题而言，英文版封面强调的是“纵乐的困惑”中的困惑（confusions），产生这种困惑的正是像封面上的杨茂林们一样的地方士绅，这实际上也是在“士绅与明清社会”语境中讨论的延续。1993年，卜正民在哈佛大学师从孔飞力教授撰写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该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在从16至17世纪的晚明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参与到地方活动，如向地方佛教寺院捐赠等行为，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士绅社会”。这个士绅社会既有着强烈的与国家分离的倾向，却又始终无法彻底地与之分离，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承继了这种对士绅及士绅社会的学术旨趣，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进一步将“士绅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让渡追溯到了明朝中叶，而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对士绅产生的影响，也成为作者新著中讨论的焦点。

至于简体中文版的封面，其画面中所描绘的每一个细节，乃至所营造的整体氛围，无一不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是一部关于明代中国经济的著作。简体中文版封底附录的“2000年李文森图书奖颁奖辞”中的只言片语，或许有助于我们明白出版商的苦心：“在进行他那仿佛生活在明朝的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旅的同时，卜正民展示了明代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如他所说的：‘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国的月亮牵引着。’”卜正民这句极具煽惑性的话，出现在本书的引言中，是他针对 Adshead 提出的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心说（*China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95）观点提出异议时说的（第14-15页）。如果我们同时注意到，强调16世纪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另外两部著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正好也是在1998年和2000年相继出版，并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学界内外引起激烈的讨论，那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纵乐的困惑》简体中文版出版后，最先受到的关注是来自中国经济学界。在“16世纪中国经济中心”的语境下，英文版出版6年之后的中译本，标题“纵乐的困惑”的关键词，也悄然地由“困惑”让渡给“纵乐（pleasure）”了。

在结束上述对中英两个版本的封面臆测性的评析之前，且让我们来看看作者的态度与定位如何：

明朝时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本书即是对那个中心的描述。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目前来说，写一部精确的明朝经济史还不可能），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这是一部关于商业在明代社会所起作用的书：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英文版作者序第2-3页）

商业有它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因为流动和财富改变甚至全然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象张涛这样的士大夫们的社会期望。这些影响引起了我的兴趣，发掘这些影响的意义——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就是本书的目的。因此你将读到的与其说是一部明代的经济史，还不如说是一部文化史。（引言第13页）

无论是中译本还是英文版的封底，都附有耶鲁大学历史系史景迁教授的推荐评语。像《纵乐的困惑》这么一本以散文式写法完成的史学著作，由史景迁教授来推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通过讲述历史上一位位鲜活人物的故事，不论是被人遗忘的一类人，还是浓墨重彩的帝王将相，从而完成对宏大主题的阐释，在史景迁用来已是那么纯熟。随着史景迁著作中译本的先

后问世，他那文学化的叙述风格，从早期描绘山东鄒城一位同样作为一个人被遗忘的王氏逃亡故事时的略显杂乱，还是讲述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故事时的游刃有余，已经为越来越多汉语文化圈的年轻学子们所熟悉。而在英语文化圈，史景迁式的叙述方式，以及他挖掘史料的不同眼光，还有地域研究视角的先行尝试等，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开始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后继者们产生一定影响。卜正民在本书中对叙述中转承起合的特别留意，以及行文过程中的娓娓道来，就甚投叙述史学的口味，而能得到“赏心悦目（joyful）”的评语，也表明了史景迁对其的肯定。流畅的叙述，对于非学术读者群以及学术队伍中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在享受着叙述的快乐时，也面临着困惑。

除却遣词造句和行文结构上的推敲与用心外，叙述史学的魅力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细节的描述上。且不说本文中自始至终对张涛的个人心路，以及他生活世界的重现，就是古城墙上的一块墙砖，在作者的讲述之下，也让读者了解到明代窑匠们生活的大致情形，从而还历史以血肉，尽可能地再现了历史的生动。对细节的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如叙述的发散性。在讲到墙砖以及窑匠故事的时候，与之相关地，从国家制度如里甲、户口统计，到社会生活中的交通运输、宗教寺院等，也都被连带着——呈现，“拔出萝卜带出泥”既是手段，也是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优秀的叙述史学作品，相应地也就是一部整体史。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叙述史学首先应该处理的以下难题：

1. 体制的制约。卜正民在序言的致谢名单中特别提及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他的宽容与激励，使得本书得以以如今的面目出现，但很显然，无论在篇幅还是写作风格都无法放进崔瑞德最初约撰的《剑桥中国史》中（第 8 卷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一章）。但对于那些略显粗糙的叙述风格的文章来说，铺垫过多使得篇幅的增加，行文的结构化造成的难以取舍，以及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学科的社会科学性质与规范的忤逆，多少都制约了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的可影响力。

2. 实践的危险。就故事的讲述者而言，除了其本人的意识形态因素之外，从技术层面的实践来说，出于叙述完整性的追求而产生的庞杂与泛主题的危险，也是应时刻反省的。就本书而言，无论是关于明代的商业、文化，还是其他诸如交通、社会生活等问题，虽然不乏类似“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国月亮牵引着”这样的精彩论断，但还是有不够深入透彻的缺憾。

当然，无论采取何种叙述方式和编排方法，作为严格的史学著作，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仍然还是对史料及其客观性的科学态度。故事要讲得精彩，还要论从史出。就挖掘相关史料，拓展史料范围，以及从史料出发来说，本书还是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的。

本书的作者卜正民，是一位 1951 年出生的加拿大人，先后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文学士，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长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教授中国历史。这本书是他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第三部著作，此外他还编著了关于近代及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况的著作若干。这种跨领域的学术关怀在本书的写作中也有体现。在“英文版作者序”中，当谈到写作动机时，卜正民追溯到了他的学生时代，在复旦大学接受到的晚明哲学知识激发了他对明朝的兴趣。那一年是 1976 年。此后不久，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开始了巨大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6-03-07

作者简介：罗艳春，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